

讀者參考
叢書

READER'S REFERENCE DIGEST

重訪古典

世界流行的時髦：簡朴
再富不能富孩子
聽作家聊足球
在關鍵領域出類拔萃
體制風險由誰承擔？

18

1997年12月出版

目 录

-
- 4 体制风险由谁承担？
- 7 反思休克疗法
——前东欧国家转轨进程述评
- 10 当代都市文化略论
-
- 15 中国经济将重蹈南美覆辙？
- 17 哈马斯：中东和平的“杀手”
- 19 理解亨廷顿
- 20 日本人怎么“玩”砸了？
-
- 22 我的送礼史
- 23 “青春热线”手记
- 28 “王义堂现象”堪思量
- 29 贷款读书，难在何处？
-
- 30 我国市场格局发生七大变化
- 20 要尽快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 20 中国股市正面临结构性调整
- 31 未来五年会有一万多家国企破产
- 31 劳动预备制度试点即将实施
- 32 我国经济发展优势开始西移
- 32 修路永远不会重复建设
- 32 商品房积压惊人
- 32 国家拟建十大医药集团
- 33 干部工资制度亟需改变
- 33 无限制审批权是腐败根源之一
- 34 我与顾准的交往
——吴敬琏访谈录
- 36 钟沛璋：胡耀邦的一支笔
- 37 诗人外交家周南剪影
- 41 末任港督的归宿
- 43 巾帼不让须眉
——记香港特区首任政务司长陈方安生
- 45 近邻董乐山
- 47 38岁的俄国第一副总理涅姆佐夫
-
- 51 重访古典
- 54 千年编钟前卫谭盾遭遇1997
- 57 热潮退后话《廊桥》
- 62 三个不同背景的林则徐
- 64 世界邮票趣闻
- 67 美术为何越来越不“美”？
- 50 中国广告再败戛纳
-
- 68 漫长的爱情，短暂的婚姻
- 71 潘虹谈情说爱
- 74 父母恩爱是孩子最好的“补品”
- 75 说说王刚成方圆
- 78 韩美林：多情反被无情恼
- 81 征婚广告
- 82 你如何看待同居？
- 84 男人与女人
-

-
- 85 莱蒙湖畔访“雀巢”
88 在关键领域出类拔萃
——成功企业的制胜法宝
-
- 91 莫扎特的音乐作品与数学
的“黄金分割”
92 欧洲的宫廷舞蹈
94 谁是“印象画派”的第一创
始人?
-
- 95 想当官
96 无敌无友
——知识分子的为学与做人
97 何必太完美?
98 另一种爱
61 论简洁
90 现代修养七要素
-
- 100 Intranet: 网络空间的
新大陆
101 未来战场新宠儿——
武装直升机
103 深蓝的力量
-
- 106 杨振宁谈教育
107 中学打基础,影响一辈子
107 教育孩子的12条“规则”
108 再富不能富孩子
109 “听话”儿童是问题儿童
110 你应该有一手好字
-
- 111 听作家聊足球
115 马球运动发源于藏族
116 一位几近残废的奥运
冠军
-
- 117 人身上的海洋印记
120 人类生活环境为什么
缺碘?
94 世界10种最珍贵的动物
-
- 121 走近汪曾祺
124 曹禺谈他的“四大名著”
-
- 126 香港:融合与反差
——闲谈香港文化
129 香港楼市出现新景象
-
- 130 俄罗斯电影业现状
131 留美两题
翻兜
什么是你的早餐?
-
- 134 柏林今昔
137 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
138 奥地利为何社会稳定?
139 二〇〇〇年大朝圣
140 美国为什么不流行VCD?
142 泰国:金融开放终成苦果
143 世界流行的时髦:简朴
144 挪威的“福利蛋糕”
145 欧洲的书籍艺术
145 国花与国民性
-
- 146 故事梗概:英国病人
-
- 149 保健新观念:“消毒”重于
“进补”
150 音乐为何使人长寿?
151 空调病与微气候保健
-

-
- 93 限食长寿
99 感冒与生活方式有关
151 生活中的几点误区
152 睡觉“四带”损健康
153 随身听与听力障碍
154 吃出来的近视眼
154 变色眼镜少戴为佳
155 旅游之时须防莱姆病
155 食物热量简便计算法
156 当心青春期牙龈炎

- 156 人为什么会得癌症?
157 男人步入五十五……
87 老年人请放心吃鸡蛋

资料室

- 157 跨国公司
157 耶路撒冷
159 世界银行

封面 秋思(原载《摄影画报》)

封底 幌子(原载《世界知识时报》)

体制风险由谁承担？

□ 陈 淮

1997年7月，当中国股市走出一轮与“回归”气氛和宏观经济形势极不相称的“大跳水”行情时，人们有理由提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由历史因素和体制缺陷造成的1万余亿元银行不良债权的风险该由谁承担？

一、风险在哪里

1997年是“金融风险防范年”。尽管人们对此耳熟能详，却很少有人穷究，这“风险”究竟指什么。

对国民经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的金融风险在于银行庞大的不良债权及其增长速度。据1996年公开披露的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数据统计，全国32.2万户预算内国有企业总资产为7.29万亿元，负债为5.18万亿元，资本金仅为2.11万亿元，负债率为71%；在上述债务中，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及长期拖欠等不良债权约占20%（1995年的数据是1.06万亿元）。银行是企业。银行对存款人的负债是到期必须归还的。如果大量企业不能归还银行贷款，导致不良债务超过银行的自有资产，银行就要倒闭，并可能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信用危机。“九五”开局，在通货膨胀压力初步化解之后，银行不良债权已成为国民经济

良性发展的心腹大患，化解企业不良债务迫在眉睫。

二、大面积“破产”之路不通

1996年，人们曾试图把解决不良债务问题和企业改革联系起来。其基本思路，一是“贷改投”，即将部分80年代“拨改贷”形成的体制性债务转换为国家投资，其实质是由国家把一部分企业债务承担起来，把企业欠银行钱转变为国家欠银行钱；二是“破产与资产重组”，即对一部分确实扭亏无望的企业实施破产、兼并等措施，以银行坏帐准备金冲销其债务。这两种思路都已局部付诸实施。但在实践过程中，第一种思路受到了国家财政能力的限制；第二种思路遇到了银行的强烈反对。银行方面提出：现在情况下的企业破产实际是破银行的产，这不仅不能规避金融风险，反而只会加速金融危机的爆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趋于激化。

三、发育资本市场与让老百姓直接投资

显然必须另辟蹊径。1万余亿实际已经亏损殆尽的不良债权必须在银行、财政之外找到一个心甘情愿的“买主”。

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了1996年底

已近4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上。通过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债券，依靠资本市场把间接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的思路很快成为主流并日渐成熟。

发育资本市场方案的操作核心，简单说，就是把目前老百姓的钱存入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的这种间接投资模式转变为老百姓直接购买企业股票或债券，直接投资企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原来由银行承担的投资风险改由直接投资人承担。

1997年4月中旬，在海南省经济特区的海口市这样一个“体制外区间”，由一个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却又不属任何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召集，由各方面政策研究机构专家参与的“研讨会”对资本市场方案进行了最后论证。

万事俱备。4万亿存量和每年1万亿增量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主角。

四、上市额度向国有大企业倾斜意味着什么？

资本市场方案几乎立即得到了各方面社会经济利益主体的认同。

银行方面笑逐颜开。一方面老百姓直接投资将把银行从“风险屏蔽”的尴尬地位中解脱了出来。另一方面，上市额度向国有大企业倾斜实际上意味着向银行不良债权的主要债务人倾斜。当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募集到大量资金时，银行对企业的不良债权也就转换成为了良性

债权。

产业主管部门欢欣鼓舞，多年来制约产业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竞争力的资金“瓶颈”终于有望缓解。

国家财政部门大力支持。能够卸下企业债务负担而又不让财政背包袱的方案曾长期索求而不可得。

地方政府兴高采烈，纷纷从争“破产”额度转为争上市额度。因为前者最多只能让当地的企业卸下债务负担，但并不能实际获得任何资金增量；而后者则是两全其美。

广大股民也信心倍增。人们从新闻媒介日益增多地提到“发育资本市场”中直观地感到股市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

规避金融风险的确找到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但是，真的能皆大欢喜吗？

五、风险给谁留下？

进入5月，股市中嗅觉灵敏的大机构发动了最后捞一把的价格拉高。几乎与此同时，1996年股票发行额度增加50亿、1997年发行额度300亿的方案和严令违规的国有企业资金、银行资金限期退出股市的规定相继出台。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价格猛烈拉高背后大机构的“以进为退”策略。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大规模增发股票与严令“违规”资金退场的紧密相随意味着什么。

一个既定的后果即将发生。但股评家们仍在连篇累牍：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规范化的必然过程，反弹就在眼前。然而事实是，当潮水般涌

来的新股杀进场、股价如高台跳水般下泄时，人们才惊愕地发现，仍在场中承担风险的只剩下散户一个群体。

此时或许有人大梦初醒般地意识到国有资金退场蕴含的深意。但这时已没有一个人可以侥幸逃脱。

六、1997，资本市场的利益取向

如果说在此之前，政府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确实是扶持与规范的话，那么在1997，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的利益已经直接地加入到了这一市场中来。最大限度地转嫁国有银行风险、剥离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资本市场必须沿这一利益取向发展。

正常、公开的市场是这样一种状态：每一参与者都能够以买者或卖者的身份平等地竞争，如果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利益极大地介入其中时，其他参与者还有多少胜的希望？当你和裁判员赛球时，你还指望赢么？

七、把投机转向投资？

应该说，通过加快股市扩容速度来规避银行金融风险 and 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将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这一发展的最终受益者还是社会全体成员。从理论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广大股民也并非没有普遍受益的可能。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人们不是指望在短期的买进卖出中获得投机收益，而是长期持有，那么通过这一过程筹集到的

大量资金将有可能极大地促进中国产业发展。三五年后，投资人的确是有可能获取满意的回报的。但是这一因果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资金确实被合理使用。

国有企业原有的债务包袱是体制性弊病的反映。如果这种体制性弊病不彻底革除，那么投入的增量资金越多，亏损就越会被扩大地再生产出来。这不是危言耸听。物质资料再生产同时是特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定理。现在的上市公司中，有多少真正建立了投资人或说股东对企业的严格监督机制？地方政府正在把企业上市当作“扶贫”措施；企业把通过股票筹集的资金视为永不还本的“无息贷款”。这就是现实。

八、规律无法超越

一项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重大政策，不论制定者是否明确意识到，其背后常常蕴含着某种客观必然性。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是一个以开矿山、修铁路、办钢铁厂、造劳动工具为重要发展内容的过程，是一个以资金为主要支持要素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消费与积累的矛盾始终是左右社会进程的主要矛盾。只有把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用于积累，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当经济发展的积累要求不能通过正常方式得到满足时，它就要通过非正常方式表现出来，强制地把过度分配的消费基金再转移到

反思休克疗法

——前东欧国家转轨进程述评

□ 苏 文

如今，所谓“渐进改革”优于“休克疗法”之说在欧、亚两边都很盛行。但应当说，何谓“渐进改革”，何谓“休克疗法”，其中的定义并不是很清楚的。关于这个问题有待另文讨论。这里只指出：按一般的看法，“休克疗法”在狭义上专指用收缩财政、抽紧银根的严厉措施恢复宏观经济平衡，而在广义上则包括“大众私有化”在内的一切激进转轨措施。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人们把捷克、波兰视为前东欧地区实行休克疗法的典型，而左派复出以前的匈牙利则是不搞“休克”的典型，俄罗斯是前苏联的“休克”典型，而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背景都同俄相当

生产领域中去。例如南美一些国家曾出现过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前苏联“换发新卢布”的措施。这些非正常方式的本质无疑是一种剥夺，但这种剥夺不可避免。我国前一时期企业债务和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双膨胀”，其本质不过是积累与消费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国民收入向消费倾斜；人们把消费剩余存入银行；企业积累不足时只好向银行借贷。当这种模式再难维持下去时，

的另两个斯拉夫国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拒绝“休克”的典型。

在任何国家里，“休克疗法”都是不受欢迎的一剂苦药。因此毫不奇怪，“渐进改革优于休克疗法”的呼声一开始就很高，而匈与捷、波曾被视为这种呼声的最有力证据：1990年匈牙利经济只下降3.3%，而实行巴尔朱罗维奇“休克”方案的波兰则下降了11.6%，1991年匈牙利再下降11.9%，而实行克劳斯“休克”方案的捷克则下降了14.2%。

然而再往下就不好了：波、捷于1992年开始回升，而匈又连续下降两年，此后也回升乏力。1994年波经济增长4.6%，捷增长2.5%，而

矫正措施必然出现。不论人们怎样感到“剥夺”的无情，客观规律总要通过这种或那种具体形式强制地贯彻。这个规律就是工业化阶段积累的一般规律，这同样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证明过的。

无需任何技术图表证明，中国股市，正在发生着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正在向一个必然的趋势发展。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匈只增长1.5%；1995年波增长6.5%，捷增长4%，而匈无增长。总计转轨5年来，波兰经济跌至谷底时为剧变前的81.7%（1991年），捷克为84.8%（1991年），而匈跌至79.7%（1993年）。至1995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已回升到剧变前的96.9%，捷克回升至91.6%，连同灰色成分在内，这两国实际上可能已经超过了剧变前。而匈牙利到1995年只回升到剧变前水平的81.3%。可见从中长期尺度看，即便就最表层的经济总量指标而言，“渐进”的匈牙利实际付出的总代价也比经历过“休克”的波、捷要大，而匈取得的成果则不如波、捷。

如果就深层的经济质量指标而言这种对比就更鲜明了。经过5年的转轨，波、捷两国在恢复宏观经济平衡与建立新经济制度这两方面都走在前东欧各国的前面，其中在广义与狭义上都实行了“休克疗法”的捷克在上述两方面又都更进一步：在宏观上实现了无赤字、无通胀、低失业、外贸顺差、外汇储备大增，在制度上完成了“初级私有化”，并且在经济增长机制上率先由财政拉动型转变为出口拉动型。而只实行了狭义“休克疗法”的波兰基本实现了宏观平衡，在制度改造上则落后于捷克而领先于其他诸国。因此不少分析家都认为捷克虽在经济总量增长上目前仍落后于波兰，但在经济质量改进上则捷优于波。而与波、捷相比，目前的匈牙利就差多了。它

的宏观经济之糟，仅从东山再起的左派政府不得不硬着头皮搞“休克补课”就可见一斑。

现在包括左派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承认，与匈牙利相比，波、捷这5年来的改革显然更为成功，而波、匈、捷这几个“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可比性是很强的。就整个前东欧而言对比就更鲜明：无论就经济滑坡的持续时间与总幅度、经济回升的迟早与强度、宏观经济稳定的程度与制度改造的进展来说，捷、波在整体上都明显优于东欧其他国家（更不用说独联体国家了）。因此从5年来总的进程看，整个前苏东地区转轨最顺利、代价最小、成果最大的仍然要数这两个最典型的“休克疗法”实践国。数年前人们一提“休克”之弊，必称波、捷。曾几何时，现在不仅人们对捷克刮目相看，而且波兰“休克”方案的主持人巴尔朱罗维奇虽然很早便被牢骚满腹的选民们赶下了台，今天他在波兰却口碑颇佳，“各种民意调查中居于前列地位”，以至于倾向左派的捷克《红色权利报》感叹道：巴氏“过去并不像现在那样受欢迎”。

再看看独联体，独联体诸国整体经济状况要比前东欧诸国差一个层次，5年来危机更深，转轨更难，代价更大，成果更小。独联体中实行“休克疗法”的典型国家俄罗斯因而便取代几年前的波、捷，成了“休克疗法”全盘否定论者最常举的例证。的确，俄罗斯经济沉痾难愈。

“休克疗法”无力回春，就这一点来说它无疑是失败的。然而如果不搞休克疗法，俄国的经济就会更好些吗？恐怕未必。在独联体内变革前文化、经济、社会诸结构与俄罗斯最近似，因而最有可比性的，莫过于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关于这两个国家至少有两点是众所公认的：第一它们没有搞过“休克疗法”和激进改革，第二它们的经济状况在前苏联时期好于俄罗斯，如今却远较俄罗斯为差：1994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滑15%-16%，固为不祥；而乌克兰下降了18%-19%，白俄罗斯下降达20%-21%，更是灾难。俄罗斯1994年通货膨胀率为300%，而白俄罗斯达3000%，乌克兰更达4000%。俄罗斯预算赤字占其国内总产值的11%，而白俄罗斯占15%，乌克兰更达17%。俄罗斯人该年平均实际工资比上年高5%，而白俄罗斯却低30%，乌克兰更低35%。俄罗斯在付出了这些代价后取得的成果是所有制的改造不仅在独联体国家中领先，而且超过了变革起步更早的一些前东欧国家，仅次于波、匈、捷。到1994年底俄已基本结束小私有化，大私有化率也达25%。而白、乌两国在经历了如此危机之后改革几无进展，小私有化未完成，大私有化才开始，人民基本上仍然守着大锅饭混日子！进入1995年后，这种差别更有扩大的趋势。前苏联时期生活水平好于俄罗斯的乌、白两国，如今的生活不如俄罗斯，已使人

民心理发生变化。多数居民为俄罗斯人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1991年曾普遍投票赞成乌克兰独立，如今谋求离乌归俄的克里米亚分离主义却赢得了多数。白俄罗斯现总统卢卡申科一般被认为有左翼倾向，经常批评俄罗斯的“激进改革”而声称要学习中国，然而正是他上台后大力强化了与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使白俄罗斯成了独联体内最急于与俄罗斯经济并轨的国家。

总之，**如何评价俄罗斯的“激进改革”，就要看你跟谁比了。谁能断言俄罗斯如果没有盖达尔，如果像白、乌两国这样不死不活地“渐进”下去，今天的日子就会更好过？**

可见，无论在前东欧还是在独联体，已有的经验都不能证明这种说法，即如果不搞“休克疗法”，就可以绕开“隧道”，或者使这“隧道”变得短一些。事实上如果其他条件类似，仅就是否采用休克疗法或转轨是否“激进”而论，甚至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即**采用休克疗法和转轨比较激进的国家，其经济形势往往相对好于未采用这种方法和转轨比较缓慢的国家。**

目前，原苏东国家或因种种原因使“休克”疗程半途而废，或已经渡过了“休克”阶段而进入复苏期，除了个别的“补课”国家（如匈牙利）外，休克疗法已成了过去的话题，进一步的评价需要留给历史学家去做了。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当代都市文化略论

□余秋雨

呼唤、捍卫 都市文明

中国当代城市文化是我近来着重思考的若干课题中的一部分。较之其他方式，文化思考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它更善于进行时空上的整体把握。正如当我们置身于一千多年前已经人烟全无的新疆古城的遗迹时，其间巨大的震撼必然促使我们对城市文

化的命运作出追索与探究。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少从城市文明的角度来论证自身的生态环境，而事实上城市文明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今中国在文化上所面临的时代性的重大命题。

有的学者指出，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化运动与非城市化运动的对抗史。这样的观点确不乏其合理性。所谓城市化，就是人类在经历自然生态的过程中组合成高浓度的汇聚地，以此来构建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中国城市存在的历史并不算短，但长期以来城市的主要功能被定位于政治性机构，致使政治文化以强悍态势取代淹没了独立的

城市文明。在中国历来稀薄的城市文明中，直至晚清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龚自珍之类具有城市意识的文化思想家。这样的情形与古希腊、罗马时期城市文明即达到的繁荣显出相当大的差异。翻阅整部中国古典诗词，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基本意象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于农村，诸如，竹篱、茅舍、落日等等。尽管这些意象的创造者们本身有许多就生活在城市中，但他们几乎没有提供关于城市的文化信号，甚至以一种“客居”的心态来对待城市生活，颇有“都市里的村庄”的寂寥。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城市文明根深蒂固的陌生感和疏离感。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在吟诗人看来，不养蚕的城里人穿上丝绸是一种理当受到指责的现象。由此推断，其认为是合理的逻辑便只能是“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殊不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恰是城市在高浓度聚合下所允许也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分工的反映。只是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农村经济文化思维判断，它确实是不可理解甚至令人愤慨的。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青年人还信奉着这样一个信条：“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所谓“吃闲饭”，其基本内涵就是一切与种地没有关系的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由于对城市文明长期严

重隔膜所因袭下来的沉重的历史背负。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城市的存在是令人厌弃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走向新时代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却恰是快速建立起现代化的桥头堡——都市文明。对于一个长期对城市文明怀有强烈陌生感的民族而言，我们无论如何还存在呼唤都市文明、捍卫都市文明的必要性。在此我们不妨对中国都市文明艰难的建立过程及其盛衰更替作一番体味。勿庸讳言，中国都市文明在一片陌生中起步时，它最初的开拓是凭借外部力量而得以完成的。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都市是广州。从第一个外国商团踏上这片土地至鸦片战争的爆发，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广州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向海外开放的唯一渠道。开放培育了广州人外向型的意识观念。但是，这样的开放毕竟只是封建国家体系所容纳允许的一个开口，一旦麻烦的事情发生时，“开放”便迅速向另一面转化。于是，广州不幸成为鸦片战争的战场，不得不承担起这个城市所不能承担的重负。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已无法继续在民族情绪激烈的广州存身，急须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寻觅开辟一个新的立足点。在英国人看来，毫不具备对抗前提的上海正可以作为这样一个目标。短短几年之内，上海的租界面积达到广州的147倍，整个国际

资本的投入致使上海迅速而无可置疑地取代了广州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第一次以欧洲文明占据主导力量的城市，上海开始担负起传播城市文化的使命。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对于城市文明有一个特定的接受过程，正如唐振常先生所言，城市文化本来是一种精神性的意识形态上的事物。但是要求对其相当陌生的人们直接作出这种精神上的认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比较合理的途径即是通过物质形态（或称硬件形态）的城市文明来沟通精神形态上的城市文明，并推动其确立。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路灯、煤气等硬件设施的使用开始在市民意识中培育原先自给自足经济中所少有的“公共”概念。随着公共概念的深入，第一座公园顺理成章地出现，标志着“公共空间”意识开始向延续上千年的私家园林的传统突进。系列公共规则也在多种力量的制约下推行开来。上海在城市文明的确立过程中开始构建国际化都市的框架。

当二十一世纪距离我们咫尺之遥时，国际范围内几乎一致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下一个世纪的文化争论极有可能将最终归结到城市文明的争论上，文化将被视作城市魅力最集中的发散点而受到强有力的关注。我在新加坡讲学时，曾有人热情地请我预言，新加坡能否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我坦言，这样的可能绝对不存在。新加坡至多只有可能成为世界一个文化

的码头和枢纽。因为至今为止，新加坡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页仍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飘流到此地的一段历史。不仅新加坡，即使东京目前也未被人们公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之一。这表明，文化建设的难度着实不亚于创造若干个经济奇迹。由此亦可推及世界上有不少富裕的地方，却并不被人们特别关注，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亦无足轻重的根源。应当说，新加坡和香港在文化上的尴尬，对于上海也同样存在。这主要是因为非城市化运动给我们造成了相当强悍的干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上海至吴淞口的铁路，由于被老百姓认为破坏了祖宗的坟地，加之官方的暧昧态度，最终导致了拆除的命运。这种消减性的力量以后还在不断发生作用，直至到了新时期时我们还必须面对重建都市文明的历史命题。当上海着力于重建失落的都市文明时，情形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鲜明的事实就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南方都市的悄然崛起。尽管人们时常不屑一顾地将深圳列入“文化沙漠”的行列中，但实际的状况却是：由于较早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中国目前的文科博士中已经有四分之一学术水平高、年龄层次相当的学者汇聚到了深圳，理工科博士的比例估计还要更高一些。这种不可小觑的人才结构状况决定了深圳已经具备了产生各种学术流派的可能性，而这样

的优势恰是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所难以比拟的。从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两个城市广州与上海的盛衰更替中，我们深刻地体味到现代城市文明的潮起潮落终究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城市文明的建立确实相当艰难，而决定它的条件和因素也极其复杂多样。因此，我们还很难论断究竟哪些城市将在未来的文化走向上处于有利的领先地位。

城市文化产业的兴起

现代城市文化同产业思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城市文化在现代如果不能构成一种产业化的文化，它必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内在的生命活力。

在中国的现代文化史上，上海由于租界等特殊的历史事件而接纳了一批政治文化思想运动的先锋人物。当这样一个群体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以后，经济上的依靠成为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在上海富裕与相对自由的前提下，文化产业便作为最现实性的途径开始孕育。文化产业的发达不仅造就了上海三十年代强劲的文化态势，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产业，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景恐怕是难以设想的。在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中，北京曾发生了著名的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激烈论争。然而，所谓“白话文战胜文言文”的最终标志是什么？仅仅是白话文在论战中居于上风吗？情形远非如此。

胡适等在北京提出白话文学原则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等产业机构投入运作，以白话文印刷的教科书通过商业渠道进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中国的各个中小学开始采用白话文的教科书，新一代文化人以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课本接受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文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才真正在中国社会确立了根基。这个事实无疑揭示出现代文化取得实质性胜利的基本途径，即文化上的理论思辨成果须通过一定的商业手段转化为商品，强有力地渗透到社会整体的各个细胞中。在当时的上海，除了蔚为大观的图书出版业以外，还有电影厂、唱片公司、影院等一整套完备的产业体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剧场及其机制的作用力。北京传统的京剧为何得以在上海一度辉煌盛行？浙江乡村尚且稚拙的越剧为何能够在上海逐渐羽翼丰满？这其间，现代剧场产业制度的运作着实功不可没。在更宏观的意义上，有理由断言，没有强有力的现代文化产业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经济机制，现代文化就不可能根本性地建立。

使文化进入商品运作，这决不同等于一种单纯的经济操作，而必然涉及到振作文化自身魅力的课题。对此，我们完全应当以满怀敬意的目光来审视中国文化产业家们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文化产业家本身就是文化界中的知名学者。他们在文化产业的运作

中所发挥的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作用是其他人所不可取代的。我们所尊敬的大作家巴金、叶圣陶等一流的文化人都曾亲自参与过书店的工作，商务印书馆大老板张元济先生更堪称其间的典范。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份量？只须看一看该馆编译所所长一职的变迁过程便可略知一二。商务编译所原所长高梦旦由于不谙外语而推荐胡适来接替自己的职务。为了这个与胡适的赫然声望显得并不十分相称的职位，胡适竟然在上海整整考察了一个月，最终还是认为自己力不从心，又向商务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前来出任此职。商务印书馆一介所长的变更居然演变为现代文化史上如此隆重的一件盛事！大学者们的郑重其事显然来自于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国现代文化难以估量的推动力。在当时的上海，著名学人的汇聚程度未必能够企及北京。然而，北大、清华大学们的思想成果如果期望被广泛传播和接受的话，无一例外地还需借助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产业力量。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文化中心”的内涵进行一番新的理解。上海作为公认的文化中心，其实在很大意义上指的是一种文化运作的中心。这便提醒我们，一个缺乏文化运作能力的教授学者的集中地事实上很难被认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中心，至多只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研究机构。同样，现代都市文化

如果不使自己有效地进入产业化的轨道，也极有可能陷入尴尬境地，至少难以被认同为真正完备的现代都市文化。

现代都市文化在总体上具有三个比较有前景的市场，可为我们的规范性运作提出思路。其一，电视。目前，我国电视的播放能力与拥有可播出片源量的比例为8:1。如此之大的空缺如何填补，这不仅关系到市场运行，也直接为我国电视文化品位的提高提出了现实性的课题。其二，旅游。现代旅游观念已不局限于自然风光的领略，大量表演因素和娱乐场面必不可少地介入其间，在更大程度上将旅游纳入文化产业的范畴。其三，表演。在这个市场中，国外音乐剧的繁荣景观令人惊叹，它几乎已经成为城市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国内已有人筹备将国外的音乐剧介绍邀请到中国演出。倘若此举通过产业方式来实现，其意义将是多重性的。

正是在文化产业家的问题上，刚开始起步的中国文化产业面临着一个微妙的处境。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人习惯于官方拨款的运行方式。对文化产业的陌生致使许多高层次的文化人、艺术家目前仍处于被动等待资金的状态，而较早有意识投入文化产业运作的又恰是一些文化层次与文化良知都较为薄弱的冒险家。这使得我们的当代文化产业建立在一个艺术品位相对低下的基础上，商业运行规则秩序混乱，

其最终结果导致了人们心目中对于文化产业诸多的误解与扭曲。近代产业的高起点、高水准就在于有张元济这样一批文人学者的参与。因此，我们的文化人、艺术家中一部分具有这样思维的人投身文化产业已是现代都市文化的必然要求。

当我们对一个社会的质量作出判断时，社会财富的流向是不容忽视的尺度。在社会财富恒定的状况下，社会财富被文明程度高的群体所占有的比例较大，社会质量就必然较高；反之，当社会财富大量为文明程度较低的群体所占有，社会质量的提高亦必然受到相当的牵制。因此，文明程度较高的人们对文化产业的介入与参与并非对金钱的暧昧，而是在都市文明走向的角度上调整和重建自身思路的体现。文化人应从人类文明的趋势上富于文化胆略地争夺占有市场，从而使自己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家，并为健全的都市文化人格的建立与形成作好必要的准备。

在对当代都市文化进行若干审视之后，我还需说明，我们所关注的包括戏剧在内的任何艺术形态，其命运演变都不可能脱离整体性的都市文化环境。以往，我们很少从这样一个视野上来思考艺术的问题。都市文化思维正有待于我们确立与开拓。

（摘自《上海文化报》）

中国经济将重蹈南美覆辙？

编者按：美国《世界日报》日前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以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为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与先进国家之间的“落差”消失以后，这些增长因素将随即丧失，而“科学技术”等“软件”动力的后继无力将变成发展的致命障碍。因此，如果不预先迅速排除这种“瓶颈制约”，中国经济在发展达到一定时候，将不可能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并有可能重蹈南美诸国80年代的覆辙。现摘要如下，供读者参考。

最近，学术界、知识界对中国的乐观论调此起彼伏，他们的根据是统计局公布的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甚至乐观地估计：按大陆现在的发展速度，在下世纪20、30年代，经济总规模GNP(国民生产总值)将在现在的基础上扩大19倍，到下世纪20、30年代“可以超过美国”。

大陆不能保持发展速度

这种论点是建筑在“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上的假设。但如对中国进行深层次的比较研究，即便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现实地对比中国在至关重要的教育、科研和社会制度导致的竞争

力等软件上、质量上与先进国家的参数，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以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为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与先进国家之间的“落差”消失以后，这些增长因素随即丧失，而“科学技术”这个最终、最根本的动力才显示出后继无力，此时这些隐患就变成了致命的。因此，如果不预先迅速排除这个“瓶颈制约”，就注定了中国经济在发展达到一定时候，将不可能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

GNP不能显示真实水平

在另一方面，GNP(国民生产总值)和GDP(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它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第一，它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生活水平。GNP所能精确统计的只是经过“市场交换”的货币规模，对那些没有经过市场交换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办法精确统计。中国80%的人生活在农村，而这里基本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农业产值没有经过统计，国家统计局连年增长的庞大数字，大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层层“估

计”上来的。

第二,GNP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结构。即使两个GNP相同的国家,其中一个经济活动大多集中在大型工业项目的投资,毫无效率的国营企业重复建设,导弹、核武器等军工产品的生产等等;而另一个经济活动主要是居民住房、文化设施、教育娱乐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虽然人民生活的内容千差万别,但在GNP上并不能反映出来。

第三,GNP不能反映出社会产品和劳务的进步。由于它只是统计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而生产技术和科技进步反而会降低产品价格,所以它反映的数字并不准确。例如,一个国家生产的汽车和电脑由于技术提高和成本下降,价格比从前,也比别的国家降低了,而GNP的数字反而变小。

国有企业无法与西方竞争

今年年初北京的《经济参考报》引述社科院的数字说,目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英国的1/30,美国的1/36,日本的1/40,德国的1/45。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素中,72%依赖于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只有28%依靠技术进步,目前的投资热只是一种假象。而美国现代化企业发展主要依赖科技进步,成为美国经济成长的基本动力。现在华尔街成长最快的企业就是高科技产业,西方的高科技产品利润回报率是中国的100多倍。凭这样的生产效率,中

国企业将难与西方竞争。在1996年的中国外贸出口中,除了20%是“原材料”外,其他的50%的出口是“加工工业”,也就是说中国只赚些外资企业的“加工费”,其他国营外贸企业大多数亏损。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根据有关报刊披露的数字表明,中国国企70%以上已资不抵债,98%的国企只能依靠国家银行贷款维持,并且大量呆帐、死帐又拖垮了银行系统,延搁了金融体制改革。1995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每人只有一元人民币。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人均个人消费、人均教育经费等这些社会发展的基本指标,在15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不增反降,列入100位以下。

“软件”竞争力倒数第二

在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联合提供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人均个人消费、人均教育经费、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基本教育普及率、文盲比率等这些软件方面,在世界46国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倒数第二。这是中国一直忽视国民教育和人口素质劣质化的显现,这也成为大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软件障碍”。大陆农村仍然封闭、愚昧,中国城市居民素质也不高,人才还不能自由流动和发挥能力。中国国民教育经费大约占GDP的3%左右,是世界上最底的少数国家之一,与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为伍。